



丛书主编 马瑞芳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

唐前小说史料研究

李剑锋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丛书主编 马瑞芳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

唐前小说史料研究

李剑锋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前小说史料研究/李剑锋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马瑞芳主编)

ISBN 978-7-5328-9090-3

I. ①唐… II. ①李…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5137号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

马瑞芳 主编

唐前小说史料研究

李剑锋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4 传真: (0531)82092625

网 址: 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mm×1000mm 16 开本

印 张: 35 印张

字 数: 49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9090-3

定 价: 93.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539-2925659



总 序

2005年我担任山东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后,考虑到学科自身优势和发展需要,拟组织本学科教授撰写一套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山东教育出版社对此选题很感兴趣,并申报国家“十一五”规划出版重点项目,获得批准。我们特别邀请山东师范大学王恒展教授加盟。历经十年,这套丛书的九部书稿终于集体亮相于读者面前。

为什么选择撰写这样一套丛书?因为此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多侧重于“史”、“论”,侧重于思想艺术分析,对小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重要文体,如何萌芽、产生、发展、壮大,直到蔚为大观,对各类小说的发展过程、阶段、特点,研究得似乎还不太够。有必要采用多角度、多侧面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脉络做一下梳理和开掘,总结出一些可以称之为规律性或中国特色的东西。

那么,这套丛书涉及并试图总结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过程中哪些规律和特色?

一曰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范围、分类。今存文献中,“小说”这个词语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外物论》: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①小说研究者早就认识到这里的“小说”是指琐屑的言论，指与“大达”形成对比的小道，还不具备文体“小说”的含义。小说在汉代之前尚缺乏独立的文体意义。在漫长的文学发展长河中，随着小说题材的拓展和小说创作艺术的渐渐成熟，“小说”才成为以散文叙述虚构故事的文学体裁的专称。中国古代“小说”一词内涵、外延都相当复杂，既有文学性文体部分又有非文学性文体部分。各朝各代学者对小说做出了各种分类。16世纪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将小说分为六类：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后三类就属于非文学性文体。后世学者对文学性小说文体的分类通常按语言形式做文言和白话之分；按篇幅做长篇和短篇之分（中篇小说通常被包含在短篇小说之内）；按内容做志怪和传奇之分，还有更具体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人情小说之分……不一而足。本丛书着眼于文学性文体小说的研究和分门别类的细致考察。

二曰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孕育、滋养过程。考察哪些文体、哪些因素对小说的产生起作用，这一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先秦两汉语言文学中。先秦两汉并没有产生典型的小说文体，但此时的多种文体如神话传说、历史散文及诸子散文、史传文学甚至《诗经》、《楚辞》都给小说的产生以或大或小、或远或近的影响。其中，神话的原型人物、典故、构思，史传文学的叙事笔法和杂史杂传，诸子中的“说体”故事和寓言故事……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起到决定性作用。本丛书对中国古代小说产生做了全面深入探讨，提出一系列新见解。如庄子对中国古代小说家的决定性影响，《诗经》、《楚辞》对小说创作的开宗作祖意义等。

三曰中国古代小说唐前史科学探究。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料是基础，是理清小说产生年代、成就、特点的必备资料，是进行理论分析的前提。汉前小说史料依附于历史、诸子，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小说作为独立的文体跻身于众多文体之中，产生大量小说作品。程毅中先生在《古小说史料简论》一书中提出：小说作品本身和版本、目录、作者生

^①《庄子集解》，《诸子集成》本，第17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平、评论等,都是重要的小说史料。本丛书在对中国古代小说各种发展阶段的重要作品进行探究时,注重考证,注重重要作家生平对小说创作影响的考察,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剖析,力求“言必有据”、“知人论事”。需要说明的是,唐后小说史料十分繁富,由于小说是“小道”的观念,唐后一些极其重要的作家如兰陵笑笑生、曹雪芹的生平往往不易弄清。因而对作家生平的考订应该成为小说史料学重要内容,如与红学并列的曹学,就是专门研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祖辈的学问。而用一本书探讨整部小说史史料问题几乎不可能,故本丛书对唐后小说史料的必要性、兼顾性研究体现在有关书中,小说史料的专门性探究暂时截止于唐前,唐后小说史料的专门性探究,留待此后有条件时增补。

四曰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发展轨迹和写作特点。中国古代两类最主要的小说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经历了萌芽、成长、繁荣、鼎盛、衰落阶段,并在各阶段产生了彪炳史册的名著。我们采用通常意义的文言和白话区分法,其实严格地说,不能用“文言或白话”截然区分中国古代许多小说,典雅的《聊斋志异》里有许多生动活泼的民间口语,通俗的《金瓶梅》中也出现台阁对话,《三国演义》则采用既非纯粹文言亦非纯粹白话的浅显文言。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如《搜神记》、《幽明录》、唐传奇、《聊斋志异》等,具有明显诗化和写意性特点,人物描写带一定类型化、“扁平”性,故事叙述、情节结构较为简约明快。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不管是短篇小说《三言二拍》,还是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重在描写情节完整、曲折生动、感人悦人的故事,或着眼悲欢离合,或着眼社会问题,人物栩栩如生,风貌复杂多样,长篇小说更具有一定的史诗品格。文言小说以志怪成就最著,白话小说描写人生成就最高。不管文言还是白话小说,在人物描写、情节布局、构思艺术上,在诗意化和寓意性上,既借力于古代文化特别是古代文学其他样式如诗词辞赋散文戏剧,小说之志怪和传奇、文言与白话,又互相融汇、互相补充、互相借鉴,共同构成中国小说特有的人物创造、构思方法、描写格局、民族特点。



五曰对小说民俗的选择性考察。中国古代小说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而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特点。因为中国古代小说所反映的民俗太复杂,涉及面太广,时间跨度太大,难以专门用一本书进行既细致又全面的研究。本丛书在剖析中国小说发展若干问题时,顺带对小说中的民俗进行综合考究,并选择跟山东有明确关系的几部名著如《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等,对小说所反映的民间信仰、饮食服饰、祭祀占卜、婚嫁丧葬、灵魂狐妖迷信、神佛道观念……进行专门考察,研究这些人生礼俗对刻画人物、组织情节起到的重要作用。作为与汉族民俗的对照,选择《红楼梦》作为对小说满族民俗的载体进行研究。除与汉族类似的饮食服饰、神佛观念外,侧重考察《红楼梦》反映的满族游艺习俗、骑射教育以及满族的蓄奴风俗和与汉族不同的姑娘为尊的重女风俗。通过这个新角度对几部古代小说名著的解读,说明古代小说特别是明清小说中表现的民族风俗是其他任何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都不能替代的。

六曰对小说传播的选择性考察。文言小说的主要传播途径不外乎史家和目录家的著录、读者传抄、类书和丛书收录、戏剧改编。白话小说的传播途径要广泛得多,在传播上也更有代表性和广泛性。印刷取代传抄成为主要传播方式,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引”的修髯子、刻印《水浒传》的武定侯郭勋等是小说印刷传播先驱。书坊为降低成本、扩大印刷推出的“简本”小说和短篇小说的选本如《今古奇观》,成为推动小说传播的重要因素。明清两代的文人士大夫成为白话小说的重要接受和传播者,“评点”变成自娱悦人兼推动小说销售的手段,白话小说改编成戏曲也很多见,三国戏、水游戏、西游戏、封神戏、杨家将戏等广受欢迎。而与广泛传播形成强烈对比、引起尖锐矛盾的是统治者的“禁毁”。其实,中国古代小说很早就传播到欧洲引起世界文豪的赞誉。《歌德谈话录》多次谈到在中国只能算做二流的小说《好逑传》、《玉娇梨》等,歌德说:在他们(中国人)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值得注意的是,歌德对中国古代几部二流小说跟《红与黑》等欧美名著持类似欣赏态度。拉美文学两



位当代文学巨匠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都崇拜曹雪芹和蒲松龄，博尔赫斯曾给阿根廷版《聊斋志异》写序并大加赞扬。

七曰古代小说理论发展研究。刘勰《文心雕龙》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偏偏没有关于小说的内容，这固然因为当时小说还处于萌芽时期，也说明小说从产生伊始，就没法取得与传统文学如诗词散文平起平坐的地位。小说被列入“子”部，算做“杂家”。“小说”者，小家珍说，雕虫小技也。小说长期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在强大的传统文化笼罩下，小说家总想羽翼信史、向历史学家靠拢，蒲松龄自称“异史氏”，就是司马迁“太史公”的模仿秀。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小说理论，也没有系统的小说理论著作，小说理论常以序跋或评点形式依附于小说本身，主要起诱导和愉悦读者的作用，不像经学家说经，诗词学家说诗词，起到写作指导作用。因此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家对小说创作经验的总结常是“捎带性”的副产品，且多需后世学者加以进一步综合阐释。古代小说理论极力与散文理论、史传文学理论相对接，以取得合法性，其核心理念、内在思路、观念表述多借鉴经史理论，特别是“文以载道”、“良史之才”等观念经常被运用。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古代小说评点家对小说具体人物、情节东鳞西爪的评点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部分吉光片羽的观点甚至可与20世纪文论家媲美。

八曰中国古代小说构思特点。中国古代小说从萌芽到繁荣，经历两千多年，无数作家付出辛勤劳动，它们形成了哪些富有中国特色的构思方法？哪位作家是哪类构思方式的开创者？哪位作家是哪类构思的集大成者？这些构思方法是如何萌芽、成长，并长成一株株小说名作的参天大树？这些形态各异的参天大树又如何共居华夏一园，形成中国古代小说构思千姿百态、摇曳生风的美景？……

这套丛书的写作目的，既想尽古代文学研究者职责，在古代小说研究中拓出新路子，完成新命题，又想古为今用、研以致用，希望通过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的比较全面的检视，使得中国古代小说与西方小说学概念、理论在纸面上接轨、“比武”，让辉煌的古代小说以蔚然如新的面貌走向读者，走向世界，引导当代读者阅读，给当代小说创作



者参考。

因为文出众手,每位作者都是此方面默默耕耘多年的专家,各有自认为必须说明之处,故可能本丛书对某些话题和观念,如“小说”词语的历史演变,或有重复涉及,乃或有此书与彼书抵牾之处,读者方家慧眼鉴识之。

古代文化典籍版本复杂,本丛书择善而从,所引用经、史、诗词、小说原文,基本采用权威通行本并在页下加以详注。

众擎群举,十年搏书,敬请读者方家指点。

马瑞芳

2015年6月12日于山东大学



综论

唐前小说史料的主要特点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先秦时期的《庄子》。《庄子·外物》在陈述完“任公子为大钩巨缗”的寓言之后云：“夫揭竿累(细绳)，趣灌渎，守鲋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高名美誉)，其于大达亦远矣！”^①庄子巧设譬喻，用“任公子为大钩巨缗”以明得大道之方，用寻常人“揭竿累，趣灌渎，守鲋鲋”以喻守小求大之难。这里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意谓“小说”乃浅薄琐碎，无关大道宏旨的言论。与“小说”类似的说法还有“小道”^②、“小家珍说”^③等。现代学者鲁迅等人以为《庄子》“小说”一词“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④，然而“‘小说’说明的是一个小道理的这个内容，却也被汉代小说家接受了下来”^⑤。事实上，汉代小说家接受下来的还有用以“饰小说”的“饰”的特点，即被人们忽视的用来修饰、论述“小家珍说”的形式特点。汉代桓谭《新论》和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两段论述小说的经典性言论就表明了这种继承关系：

①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校点：《〈庄子〉集释》下册，第92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②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2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③ [唐]杨倞注：《荀子》卷一六，《四部丛刊》影印《古逸丛书》本。

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第15页，济南，齐鲁书社，1997。

⑤ 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册，第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①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②

“小说”形式特点是“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并非是单纯的议论，而是如言说大的道术一样，需要众多的以类相从的言论，需要巧设譬喻。这与《庄子》一书的做法很相似，与《韩非子》中《说林上》、《说林下》等八篇以“说”名题的“说体”文字论述问题的形式也很相似。儒、墨、道等“大说”为了便于被人接受使用了以类相从、巧设譬喻的形式，“小说”当然也会使用这种便于听者接受的形式。说道理是“小说”和“大说”的共同目的，它们的言说形式也就存在一致之处。所以桓谭、班固对“小说”形式特点的论述既是基于汉代“小说”的实际，也是对先秦“小说”观念的继承。除了“小说”的特点，桓谭和班固还论及小说的源头和功用，“功用论”明显继承了先秦儒家关于“小道”的论点，“源头论”与先秦“小说”的产生也有一定关系。

桓谭、班固对“小说”概念的发展之处主要在于把它作为众家学说中的一家独立出来并初步对其源头、特点和功用做了言简意赅的归纳。二人对“小说”的论述显然不是从“小说”文体的角度说的，而是从“小说家”的角度观察的。而“小说家”也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小说作家，而是诸子百家之一家，实质上是其中最为末流的一家，因此《汉书·艺文志》列之诸子之末，于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家、农家九家后方列第十家“小说家”。小说家下面所列的十五家小说也就不全是文学意义上的小说，而多具有诸子百家言论的性质，也就是说，正如不能把儒、道家的著作归为“儒家文体”或者“道家文体”一样，这些非严格文体意义上的“小说”也不能完全归于文体上的小说。这些

① 《文选》卷三—江淹《拟李都尉陵从军》李善注引桓谭《桓子新论》，见南朝梁萧统编《文选》，第三册，第14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以下引用该书原文，均据此版本。

②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六册，第17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以下引用该书原文，均据此版本。



“小说”只是“稗官”、“待诏”之类的士人用以宣传自己主张的言论，这些言论与诸子百家的不同之处是：“丛残小语”、“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当然这些小说与文体意义上的小说也有相通之处，甚至有些言论，如果独立出来看，显然就是文体义上的小说；值得重视的是，班固的言论把“小说”的生活源头定位在民间的口头传说，把小说文本的最初写定者统称为“稗官”，这对探讨小说的生活源头和文本作者源头具有开山之功。

关于小说起源的探索，之所以众说纷纭，关键是论者各执一端，没有分清源头的层次性，或者说，没有把小说看作一个有生命的整体来探索，而是将小说机械地肢解为某种特点，如“虚构性”、“故事性”等。如果把小说视作一个萌生、成长的生命，那么小说的源头也就可以免除许多争端。文学的构成是一个系统的构成。根据 20 世纪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家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的观点，“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①，文学是由世界、艺术家(作家)、作品和欣赏者(读者)四要素构成的，现代文学理论应当研究四要素所构成的文学系统，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单纯地研究某一方面。这种开放的文学观念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从理论上来说，研究文学对象的渊源应当全面考察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四要素的渊源。研究小说的源头，就应该研究小说“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四个方面的源头。小说世界的源头当然来自民间生活和历史；小说作家的源头应当是“小说家”，那些与诸子百家一样把他们的言论记录下来的“稗官”；小说作品的源头，尤其是它的艺术渊源，应当是包括神话、历史、寓言、辞赋、诗歌等在内的一切文学艺术，当然其中有远近亲疏之别；小说的读者之源，既然小说本是“刍蕘、狂夫之议”(《汉书·艺文志》)，那么最初的“读者”应当也是“刍蕘、狂夫”，是下层的民众，为了遣宾娱兴，包括皇帝在内的贵族也成为“读者”。这样，小说就其源头而言，如果综合考虑四方面的因素，小说摆脱胎孕阶段，逐渐成形，大致在小说写成文本的时代，也就是“稗官”盛行的时代。因此，小说的源头就与稗官密切相关。班固所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是说到点子上的话。

^① [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其批评传统》，第 5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余嘉锡对“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有所阐释和发明。《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类云：“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蕘。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涂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①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一文^②通过将古籍中“士传言”之类的记载，与《汉书·艺文志》的稗官之说、《隋书·经籍志》所引《周官》诵训、训方氏所掌之职联系起来详加考察后，认为古代政治生活中存在采言传语的制度，而稗官正担当这一职责，稗官在周代乃传达民语之士。说稗官在周代乃传达民语之士很有道理，但也不能排除“稗官”乃一专门官职。1989年出土的云梦冈六号墓秦简第一八五号曾经出现“稗官”一词：“取传书乡部稗官。”^③有学者推断“稗官”是与《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列的乡部三老、有秩、嗇夫、游徼等“并列而称的乡里专职人员”^④。余嘉锡进而认为“汉时列士，不闻有传达民语之事，稗官之名存而实亡”。说汉代没有传达民语之士有些绝对，而实际上，汉代的“待诏以及较低级的郎官正如周代的士，他们继续扮演着‘士传言’的角色”^⑤。待诏以及较低级的郎官都是俸禄低微，为六百石以下小官或者等待皇帝不时顾问的“候补”官员，《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小说家中，像“待诏臣饶”、“待诏臣安成”就是这样的小官。在汉代，稗官不是具体的官职，而是小官，《汉书》如淳注曰：“《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颜师古注曰：“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⑥看来，古人认为，周代设立“稗官”，而汉代已经没有这个名目，

① [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四册，第10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以下引用该书均用此版本。

② 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3。

③ 《云梦龙岗秦简》，第2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

④ 曹道衡、刘跃进：《先秦两汉文学史科学》，第52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⑤ 罗宁：《小说与稗官》，《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59页。

⑥ [汉]班固：《汉书》第六册，第17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此处所言“稗官”，只是借古称对小官的通称和雅称，并非专门官职之名。稗官正是代指小官。《周礼》卷三《冢宰治官之职》曰：“（宰夫）掌小官之戒令。”注云：“小官，士也。”^①《春秋左传·襄公十四年》云：“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②又《国语·晋语六》曰：“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祆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③“在列者”，指公卿至于列士。风，采也。胪，传也。“风听胪言于市”就是于市井采听商旅民众所传之言。在周代政治制度中，小官“士”传达的正是平民百姓的意见和心声（“士传言”），也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谓的“街谈巷语，道听涂说”。因此，小说口头文本的“作者”实际上主要是下层民众，小说的书面文本“作者”才是小官。小说要等文人意义上“小说家”出现，才真正以文体意义的形式而诞生。

鉴于如上见解，我们认为，小说在汉代以前（包括汉代）尚缺乏独立的文体意义，也就是说小说与其他文体和学术纠缠在一起，其本身的价值有赖于他者的衡定，有很大的依附性；以小说而名家的作者大多缺名或者伪托，缺少严格意义上的作家从事小说创作，作家并不以创作小说为荣；小说作品大多停留在口头传闻，并没有形成经典性的阅读文本，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读者群也难以形成。因此，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下》云：“《汉艺文志》所谓小说，虽曰街谈巷语，实与后世博物志怪等书迥别。盖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黄帝》四十篇、《成汤》三篇，立义命名，动依圣哲，岂后世所谓小说乎？又《务成子》一篇，注称尧问；《宋子》十八篇，注言黄老；《臣饶》二十五篇，注言心术；《臣成》一篇，注言养生：皆非后世所谓小说也。……又《青史子》五十七篇，杨用修所引数条，皆杂论治道，殊不类今小说。”^④但毋庸置疑，汉前又是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

① 《周礼》，见《汉魏古注十三经》（上册），第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② 《春秋左传经传集解》，见《汉魏古注十三经》（下册），第2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③ 鲍思陶点校：《国语》，第200页，济南，齐鲁书社，2005。

④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第3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汉艺文志”，原作“汉艺文字”，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少室山房笔丛》改。以下引用该书正文引文不注明版本者皆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我们不妨笼统地称之为小说的“前自觉时期”，这一时期为小说的普遍盛行奠定了基础，这主要表现在：(1)“小说”一词定型；(2)“小说”的众多源头为小说的产生提供了多元的艺术滋养；(3)《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小说的初始文本，虽然没有经典传世文本，却标志着小说的初生。汉前小说的这些特点，也决定了汉前小说史料的特点。

首先，汉前小说史料具有明显的依附性。这主要表现在小说史料主要依附历史而存在，小说史料的价值主要依赖儒家讽谏观念而获得承认和保存，小说史料作者大多依托儒、道等名家而自高。刘向是在汉代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式重要意义的学者，他的目录学著作《别录》为班固《汉书·艺文志》所本，因此，《汉书·艺文志》所录小说家实本刘向；对小说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刘向编订了三部类似于小说的著作，它们是《新序》、《说苑》和《列女传》。这三本书都明显地具有历史而杂糅小说的特点。它们本于历史^①，又有作者的重新编排演说之功。如《新序》中的故事可以在《战国策》、《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等书中找到原委。^②《说苑》和《列女传》亦然。它们所分门别类辑录的历史故事对后世的影响也深意味，比如《说苑·贵德》篇中所收于定国父于公事，班固采用在《汉书·于定国传》中，而干宝小说《搜神记》也从中采录了“东海孝妇”的传说。^③就刘向诸书的编纂目的而言显然不是审美娱乐，而是有益风化。所以，刘向《说苑叙录》称：“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④看来，《说苑》(即《新苑》)的素材乃《新序》所余，《说苑》的严肃性不及《新序》，因其“浅薄不中义理”，所以要重加整理，“更以造新事”。这显然不是小说创作

① 《汉书·楚元王传》：“(刘向)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第1958页，中华书局，1962)

② 其故事原本，可参看赵善诒《〈新序〉疏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在相关条目下的辑录。

③ 二书之校勘，可参阅赵善诒《〈说苑〉疏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和张涛《〈列女传〉译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刘晓东校点《列女传·高士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列女传》的版本情况可参看张涛《刘向〈列女传〉的版本问题》(《文献》1989年第3期)一文。

④ 《说苑》卷首，《四部丛刊》所收上海涵芬楼影印明抄本。



的态度，而是实用的功利态度。然而小说的史料也因此得以保存。

其次，汉前小说史料具有难辨性。这主要表现在诸多托名汉人小说真假难辨、小说的文体难辨（神话、历史、寓言还是小说）、所谓汉人小说的真实作者难辨、学者对所谓汉人小说的研究争议甚多等问题上。下面仅就小说文体问题略作论说。如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和袁康的《越绝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云其“虽本史实，并含异闻”^①。许多学者也注意到它的小说性质，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吸收了大量民间传说、怪异神话传说，体现了小说的夸张性和虚构性。但是，它们的内容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历史，史实主要根据《国语》，兼采《左传》、《史记》；就其体例而言，也显然是历史，是人物传记史，而非小说。《吴越春秋》的目录如下：吴太伯传第一，吴王寿梦传第二，王僚使公子光传第三，阖闾内传第四，夫差内传第五，越王无余外传第六，勾践入臣外传第七，勾践归国外传第八，勾践阴谋外传第九，勾践伐吴外传第十。《越绝书》亦然，其目录如下：外传本事第一，荆平王内传第二，外传记吴地传第三，吴内传第四，计倪内经第五，请余内传第六，外传记策考第七，外传记范伯第八，内传陈成恒第九，外传记地传第十，外传记计倪第十一，外传记吴王占梦第十二，外传记宝剑第十三，内经九术第十四，外传记军气第十五，外传枕中第十六，外传春申君第十七，德序外传记第十八，叙外传记第十九。^②至于每一传记之内又按编年记述传主经历事迹。很显然，这是《史记》所开创的列传的体例。《吴越春秋》和《越绝书》都是介于历史和小说之间的文体。

再次，从汉前小说对后世的影响来看，汉前小说史料具有基因性，其母题为后世小说所承续，形式为后世小说之先基，汉人的小说观念也规约着后世小说的发展路向。《山海经》是后代志怪小说的始祖，它从题材、形象到体例、叙述方式都对后世志怪小说，尤其是博物类志怪小说（如张华《博物志》）产生了直接影响。《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形象也成为后世与汉武帝相关的托名汉代小说《汉武故事》、《汉武内传》，以及明清神怪小说《西游记》等小说中“王母”形象的原始形象。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② 二书目录分别据：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越绝书》，《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双柏堂本。



兼有历史与小说特性的杂传《新序》、《说苑》、《列女传》、《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更是后世小说和其他文体内容和艺术上的渊薮。就母题而言,最典型的例子,除了上面提到的《新序》所记于定国父于公事外,《列女传》所记秋胡戏妻事也是一个。这个富于戏剧性和道德意味的故事对后代文学影响甚大,成为诗歌、小说和戏剧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性原型故事,不断被以诗性的智慧歌咏着,被戏剧舞台演出着。如魏晋南北朝文人多有对此故事的咏叹,隋杜宝《水饰》有“秋胡妻赴水”^①,元代石君宝以之为题材演写成《秋胡戏妻》的杂剧。就形式而言,《新序》、《说苑》、《列女传》分类写传的做法,对晋、宋以还《语林》、《世说新语》等小说的体例产生了直接影响。桓谭《新论》和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述小说的经典性言论代表了汉前的基本小说观念,这一小说观念是儒家视角的综合评价,小说特性可以概括为“作为经典补充的非经典性”。“非经典性”一方面使小说长期处于正统文人士大夫关注的边缘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小说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小说保持了自身文体的特性,不淹没于其他文体之中。而“经典补充性”则一方面为小说的合理存在赢得了不可忽视的理由,另一方面也最终使小说承担起文学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不流于纯粹的游戏。汉代之后的小说理论资料大都在这个概念厘定的张力下存在。如曹植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②,刘勰说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③,他们都是在经典与非经典之间寻找小说的位置。

汉前小说的传播上也有自己的特点,即小说传播寓于其他文体的文本传播中,或者也可以说小说的传播经历了一个由口头传播到文本传播的变化。小说传播的寓托性从先秦小说资料多存在于散文中的情况可以推知。先秦诸子和历史散文中包含着明显的小说因素。其中主要的有四点:一是,散文中存在着多姿多彩的寓言故事,情节生动、形象鲜明,如果独立出来显然就是小说。二是,散文中记录了众多历史人物、思想家及其门徒的言论和逸事,如《论语》就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和逸事的汇总,虽然是实录,但颇能见出著名人物的个性风

① 鲁迅:《古小说钩沉》,第79页,济南,齐鲁书社,1997。

② 〔三国魏〕曹植:《曹子建集》卷九,《四部丛刊》影印双鉴楼藏明活字本。

③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第233页,济南,齐鲁书社,1995。